

客家学研究丛书

第二辑

Hakka
Studies

《适可庐诗集》校注

黄荐鹗 著

夏远鸣 刘奕宏 黄童 校注



暨南大學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客家学研究丛书

第二辑



《适可庐诗集》校注

黄荐鹗 著

夏远鸣 刘奕宏 黄童 校注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适可庐诗集》校注/黄荐鹗著；夏远鸣，刘奕宏，黄童校注。—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2017.1
(客家学研究丛书·第二辑)
ISBN 978 - 7 - 5668 - 1978 - 9

I. ①适… II. ①黄… ②夏… ③刘… ④黄… III. ①古典诗歌—注
释—中国—近代 IV. ①I222.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61530 号

《适可庐诗集》校注

SHIKELU SHIJI JIAOZHU

著 者：黄荐鹗 校 注：夏远鸣 刘奕宏 黄 童

出 版 人：徐义雄

策 划 编 辑：李 艺

责 任 编 辑：崔军亚

责 任 校 对：李林达

责 任 印 制：汤慧君 周一丹

出版发行：暨南大学出版社 (510630)

电 话：总编室 (8620) 85221601

营 销 部 (8620) 85225284 85228291 85228292 (邮购)

传 真：(8620) 85221583 (办公室) 85223774 (营销部)

网 址：<http://www.jnupress.com> <http://press.jnu.edu.cn>

排 版：广州市天河星辰文化发展部照排中心

印 刷：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960mm 1/16

印 张：13.75

字 数：242 千

版 次：201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7 年 1 月第 1 次

定 价：36.00 元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本丛书出版得到以下研究机构经费资助：

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

梅州市客家研究院

广东省客家文化研究基地—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

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

理论粤军·广东地方特色文化研究基地—客家文化研究基地

广东省粤台客家文化传承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

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省市共建重点研究基地—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

客家学研究丛书·第二辑编委会

顾 问：(以姓氏笔画为序)

丘小宏 刘志伟 何星亮 陈春声
周大鸣 房学嘉 麻国庆 谢重光

主 编：邱国锋

副主编：肖文评 宋德剑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冷剑波 罗 鑫 周云水 钟晋兰 夏远鸣



黃荇鵠遺像

民國九年秋暮歸國，遇紹美先生，自謂新
客西里人，士人公，其祖祖祖父，歷官至太常卿，
時任大員，已故。其子孫，繼承其業，領頭巾，稱
紹美先生，是時以古稀之年，居於上海，月餘，林摩前定。
而先生之調，竟在斯月之間，官居三使，人所知也。謹此
不言。北游於此，惟是此行，留念，亦可為之。

久矣延僑一擇，丹青空仰。魯
翰光輝江濱，傳人口南。彌勒、
銀鍔列刻章。先生有元詩行遺，足證
鑄影父母，一宣小試。學劍，黃、閻、
張、鶴歸象日，休舊劍。行旅如歸。
戊生凋瘵意淒然，後輯客鴻政責先考。
續何妨居下等，讀書安有參前賢。貌跡
過境勞供僊，賦役覓時卸竹肩。君是首
陳非巧宦，更無得失計心田。

信。信。信。信。信。信。信。信。信。信。信。
余冠駕，寧官署。自現僕星，傳君齊辭。
如人意，仰其風。飮食內慈，入籞。侈家別
調。渭樽忽弦。唱何哉？
化作波濤聚。當時每逢高會酒盈卮。文情忽
向南洲別。歸思初泛。身海馳。是生平如茲。
守鄉閭。勞聘問。車轎里第。上樓遙。水作事計。
安排七尺。陳幕榻。日待徐辦。叙舊知。
紹美先生今聖朝政。從樹青。為鵠。

校注说明

一、原诗集中的注释以竖排夹注的方式，今以横排，仍保留原夹注。

二、原诗集后有勘误表，今依勘误表将原文直接改定。

三、对于诗文中出现的人名、地名等只进行必要的注释（采用文后注），以避免繁复。

四、除诗稿外，还将作者一篇序文收录附后。

（注：原书名由吴凤声题写。吴凤声，号幼初，广东梅县水南堡人，务本中学堂创始人吴登初之子。先后就读于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和日本明治大学。曾任广东新会县、清远县县长）

总序

客家文化以其语言、民俗、音乐、建筑等方面的独特性，尤其是客家人在海内外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突出贡献，引起了历史学、人类学、民俗学和语言学等诸多学科领域内学者的关注。而随着西方人文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在 20 世纪初传入我国，客家历史与文化研究也逐渐进入科学规范的研究行列，并相继出现了一批具有开创性的研究成果。1933 年，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的出版，标志着客家研究进入了现代学术研究的范畴。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著作、论文等研究成果的推陈出新，也在呼吁学界能够设立专门的学科并规范客家研究的科学范式。

作为国内较早成立的专门从事客家研究的机构，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用二十五载的岁月，换来了客家研究成果在数量上空前的增长，率先成为客家学研究的重要阵地，也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关注。但若从质的维度来看，当前的客家研究还面临一系列有待思考及解决的问题：客家学研究的主题有哪些？哪些有意义，哪些纯粹是臆测？这些主题产生的背景是什么？它们是如何通过社会与历史的双重作用，而产生某些政治、经济乃至文化权力的诉求与争议的？当代客家研究如何紧密结合地方社会发展的需要，又如何与国内外其他学科对话与交流？诸如此类的疑惑，需要从理论探索、田野实践和学科交叉等层面努力，以理论对话和案例实证作为手段，真正实现跨区域和多学科的协同创新。

一、触前沿：客家学研究的理论探索

当前的客家学研究主要分布在人文社会科学的诸多学科范围之内，所以开展卓有成效的客家研究自然需要敢于接触不同学科领域的学术理论。



比如，社会学科先后出现过福柯的权力理论、布尔迪厄的实践理论、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鲍曼的风险社会理论、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卢曼的系统理论、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和亚历山大的文化社会学理论。^① 社会科学研究经常需要涉及的热点议题，在客家研究中同样不可回避，比如社会资本、新阶层、互联网、公共领域、情感与身体、时间与空间、社会转型和世界主义。^② 再比如，社会学关于移民研究的推拉理论、人类学对族群研究的认同与边界理论以及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的机制，都可以具体应用到客家研究上，并形成理论对话而提升客家研究的高度。在研究方法上，人文社会科学提倡的建模、机制与话语分析、文化与理论自觉等前沿手段，^③ 都可以遵循“拿来主义”的原则为客家研究所用。

可以说，客家研究要上升为独具特色的独立学科，首先要解决的便是理论对话和科学的研究的范式问题。客家学作为一门融会了众多社会人文学科的综合性学科，既不是客家史，也不是客家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内容的汇编或整合，而是一门以民族学基础理论为基础，又比民族学具有更多独特特征、丰富内容的学科。^④ 不可否认的是，客家研究具有自身独特的学术传统，但要形成自身的理论构架和研究方法，若离开历史学、文献学、考古学、人类学、语言学、社会学、民俗学等诸多学科理论的支撑，显然就是痴人说梦。要在这方面取得成绩，则非要长期冷静、刻苦、踏实、认真潜心研究不可。如若神不守舍、心动意摇，就会跑调走板、贻笑大方。在不少人汲汲于功名、切切于利益、念念于职位的当今，专注于客家研究的我们似乎有些另类。不过，不管是学者应有的社会良知与独立人格，还是人文学科秉持的历史责任与独立思考的精神，都激励我们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在触碰前沿理论上不断探索，以积累学科发展所需的坚实

^① DEMEULENAERE P. *Analytical sociology and social mechanism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② TURNER J H ed. *Handbook of sociological theory*. New York: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2001.

^③ JACCARD J & JACOBY J. *Theory construction and model-building skills*.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2010.

^④ 吴泽：《建立客家学刍议》，载吴泽主编：《客家学研究》（第2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理论。

要做到这一点，就得潜下心来大量阅读国内外学术名著，了解前沿理论的学术进路和迁移运用，使客家研究能够进入国际学术研究对话的行列。

二、接地气：客家研究的田野工作

学科发展需要理论的建设与支撑，更离不开学科研究对象的深入和扩展，而进入客家人生活的区域开展田野工作，借助从书斋到田野再回到书斋的螺旋式上升的研究路径，客家研究才能做到“既仰望星空又能接地气”，才能厚积薄发。

人类学推崇的田野工作要求研究者通过田野方法收集经验材料的主体，客观描述所发现的任何事情并分析发现结果。^① 田野工作的目标要界定并收集到自己足以真正控制严格的经验材料，所以需要充分发挥参与观察、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的手段。从学科建设和学科发展的角度，客家族群的分布和文化多元特征，决定了客家研究对田野调查的依赖性。这就要求研究者深入客家乡村聚落，采用参与观察、个别访谈、开座谈会、问卷调查等方法调查客家民俗节庆、方言、歌谣等，收集有关客家地区民间历史与文化丰富性及多样性的资料。

而在客家文献资料采集方面，田野工作的精神同样适用。一方面，文献资料可以增加研究者对客家文化的理解，而且还可以对研究者的学术敏感和问题意识产生积极影响；另一方面，田野工作既增加了文献资料的来源，又能提供给研究者重要的历史感和文化体验，也使得文献的解读可以更加符合地方社会的历史与现实。譬如，到图书馆、档案馆等公藏机构及民间广泛收集对客家文化、客家音乐、客家方言等有所记载的正史、地方志、文集、族谱及已有的研究成果等。田野调查需要入村进户，因此从具有深厚文化传统的客家古村落入手，无疑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客家地区开展田野调查，需要点面结合才能形成质量上乘的多点民族志。20世纪90年代，法国人类学家劳格文与广东嘉应大学（2000年改

^① [挪] 托马斯·许兰德·埃里克森著，周云水、吴攀龙、陈靖云译：《什么是人类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65—67页。



名为嘉应学院)、韶关大学(2000年改名为韶关学院)、福建省社会科学院、赣南师范学院、赣州市博物馆等单位合作,开展“客家传统社会”的系列研究。他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辗转于粤东、闽西、赣南、粤北等地,深入乡镇村落,从事客家文化的田野调查。到2006年,这些田野调查的成果汇集出版了总计30余册的“客家传统社会”丛书,不仅集中地描述客家地区传统民俗与经济,还具体地描述了传统宗族社会的形成、发展和具体运作及其社会影响。

2013年以来,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选择了多个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古村落,以研究项目的形式开展田野作业,要求研究人员采用参与观察、深度访谈、文献追踪等方法,对村落居民的源流、宗族、民间信仰、习俗等民间社会与文化的形成与变迁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形成对乡村聚落历史文化发展与变迁的总体认识。在对客家地区文化进行个案分析与研究的基础上,再进行跨区域、跨族群的文化比较研究,揭示客家文化的区域特征,进而梳理客家社会变迁和文化发展过程。

闽粤赣是客家聚居的核心区域,很多风俗习惯都能够找到相似的元素。就每年的元宵习俗而言,江西赣州宁都有添丁炮、石城有灯彩,而到了广东的兴宁和平县,这一习俗则演变为“响丁”,花灯也成了寄托客家民众淳朴愿望的符号。所以,要弄清楚相似的客家习俗背后有何不同的行动逻辑,就必须用跨区域的视角来分析。这一源自田野的事例足以表明田野调查对客家学研究的重要性。

无论是主张客家学学科建设应包括客家历史学、客家方言学、客家家族文化、客家文艺、客家风俗礼仪文化、客家食疗文化、客家宗教文化、华侨文化等,^①还是认为客家学的学科体系要由客家学导论、客家民系学、客家历史学、客家方言学、客家文化人类学、客家民俗学、客家民间文学、客家学研究发展史等八个科目为基础来构建,^②客家研究都无法回避研究对象的固有特征——客家人的迁徙流动而导致的文化离散性,所以在

^① 张应斌:《21世纪的客家研究——关于客家学的理论建构》,《嘉应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

^② 凌双匡:《建立客家学的构想》,《客家大观园》1994年创刊号。

田野调查时更强调追踪研究和村落回访^①。只有夯实田野工作的存量，文献资料的采集才可能溢出其增量的效益。

三、求创新：客家研究的学科交叉

学问的创新本不是一件易事，需要独上高楼，不怕衣带渐宽，耐得孤独寂寞，一往无前地上下求索。客家研究更是如此，研究者需要甘居边缘、乐于淡泊、自守宁静的治学态度——默默地做自己感兴趣的学问，与两三同好商量旧学、切磋疑义、增益新知。

客家研究要创新，就需要综合历史学、人类学、语言学、音乐学、社会学等学科理论和方法，对客家民俗、客家方言、客家音乐等进行综合分析和研究，以学科交叉合作的研究方式，形成对客家族群全面的、客观的总体认识。

客家族群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个重要支系，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融合多个山区民族的文化，形成独具特色的文化体系。建立客家学学科，科学地揭示客家族群的个性和特殊性，可以加深和丰富对中华民族的认识。用客家人独特的历史、民俗、方言、音乐等本土素材，形成客家学体系并进一步建构客家学学科，将有助于促进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发展，从而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和繁荣作出应有的贡献。客家人遍布海内外 80 多个国家和地区，客家华侨华人 1 000 余万，每年召开一次世界性的客属恳亲大会，在全世界华人中具有重要影响。粤东梅州是全国四大侨乡之一，历史遗存颇多，文化积淀深厚，华侨成为影响客家社会历史和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建立客家学学科，将进一步拓宽华侨华人研究领域，有助于华侨华人与侨乡研究的深入发展。

在当前客家学研究成果积淀日益丰厚、客家研究日益受到社会各界重视的情况下，总结以往研究成果，形成客家学学科理论和方法，构建客家学学科体系，成为目前客家学界非常紧迫而又十分重要的任务。

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敢啃硬骨头，在总结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完成目前学科建设条件已初步具备的客家文化学、客家语言文字学、客家音

^① [美] 科塔克著，周云水译：《文化人类学——欣赏文化差异》，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 457—459 页。



乐学等的论证和编纂，初步建构客家学体系的分支学科。具体而言，客家文化学探讨客家文化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并揭示其发生、发展规律，分析客家族群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产生、发展过程及其特征。客家语言文字学探讨客家方言的语音、词汇、语法、文字等的特征，展示客家语言文字的具体内容及其社会意义。客家音乐学探讨客家山歌、汉剧、舞蹈等的发生、发展及其特征，揭示客家音乐的具体内容和社会意义。

客家族群是汉族的一个支系，研究时既要注意到汉文化、中华文化的普遍性，又要注意到客家文化的独特性，体现客家文化多元一体的属性。客家学研究的对象，决定客家学是一门融合历史学、民俗学、方言学、音乐学、社会学等众多社会人文学科的综合性学科。如何形成跨学科的客家学研究理论与方法，是客家研究必须突破的重要问题。唯有明确客家学研究的基本概念、理论和方法，通过广泛的田野调查和深入的个案研究，广泛收集关于客家文化、客家方言、客家音乐等各种资料，从多角度进行学科交叉合作的分析和研究，才能实现创新和发展。

嘉应学院地处海内外最大的客家人聚居地，具有开展客家学研究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1989年，嘉应学院的前身嘉应大学率先在全国建立了专门性的校级客家研究机构——客家研究所。2006年4月，以客家研究所为基础，组建了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梅州市客家研究院。因研究成果突出、社会影响大，2006年11月，客家研究院被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评为“广东省客家文化研究基地”；2007年6月，被广东省教育厅评为“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省市共建重点研究基地”。之后其又被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省社会科学院评为“广东地方特色文化研究基地——客家文化研究基地”，被广东省文化厅评为“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被广东省教育厅评为“广东省粤台客家文化传承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还经国家民政部门批准，在国家一级学会“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下成立了“客家学专业委员会”。

2009年8月，在昆明召开的第16届国际人类学大会上，客家研究院成功组织“解读客家历史与文化：文化人类学的视野”专题研讨会，初步奠定了客家研究国际化的基础。2012年12月，客家研究院召开了“客家文化多样性与客家学理论体系建构国际学术研究会”，基本确立了客家学

学科建设的基本途径和主要方法。另外，1990年以来，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坚持每年出版两期《客家研究辑刊》（现已出版45期），不仅刊载具有理论对话和新视角的论文，也为未经雕琢的田野报告提供发表和交流的平台。自1994年以来，客家研究院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项，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等20余项，出版《客家源流探奥》^①等著作50余部，其中邱国锋等的著作《兴宁市总体发展战略规划研究》^②获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肖文评的专著《白堠乡的故事——地域史脉络下的乡村建构》^③获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房学嘉的专著《粤东客家生态与民俗研究》^④获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深厚的研究成果积淀，为客家学学科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嘉应学院的客家研究已经具备了在国际学术圈交流的能力，这离不开多学科理论对话的实践和田野调查经验的积累。

客家学研究丛书的出版，既是客家研究在前述立足田野与理论对话“俯仰之间”兼顾理论与实践的继续前行，也是嘉应学院客家学研究朝着国际化目标迈出的坚实步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套丛书包括学术研究专著、田调报告、教材、译著、资料整理等，体现了客家学学科建设的不同学术旨趣和理论关怀。古人云，“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我们愿意从点滴做起。希望丛书的出版，能引起国内外客家学界对客家学学科体系建设的关注，促进客家学研究的科学化发展。

嘉应学院校长兼客家研究院院长 邱国锋教授、博士

于2014年8月30日

① 房学嘉：《客家源流探奥》，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

② 邱国锋等主编：《兴宁市总体发展战略规划研究》，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10年。

③ 肖文评：《白堠乡的故事——地域史脉络下的乡村建构》，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

④ 房学嘉：《粤东客家生态与民俗研究》，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9年。

践行“我手写我口”的诗令尹

——黄荐鹗和他的《适可庐诗集》

广东梅州是诗人成长的一片沃土，宋湘、李黼平、李光昭、黄遵宪、丘逢甲、李金发、蒲风，在中国诗歌史上都拥有重要的席位，其余如廖纪、徐青、黄香铁、温训、叶璧华、林良铨、胡曦、黄药眠、温流等梅州籍诗人，犹如点点繁星，在诗歌的殿堂闪耀光芒。

在这片名家辈出的梅山梅水间，钟灵毓秀的山水还孕育出一大批诗歌的精灵，他们像云雀般鸣唱，真情歌咏胸臆和家乡。像著名诗人黄遵宪的家乡——梅州东郊的攀桂坊，除了黄遵宪和李黼平、李光昭、叶璧华、黄药眠成就卓然外，其实还有众多繁茂的绿叶，烘托出红花的艳丽，如黄基、李仲昭、李季子、黄澜、李素英等亦在诗国，辟出一片天地。

《适可庐诗集》的作者也来自攀桂坊，虽然他的诗才被星光熠熠的前辈们掩盖，但他以辛勤的笔耕，以写实的风格，践行他的同乡族兄黄遵宪“我手写我口”的诗歌主张，留下的诗歌，为后人观察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风云变幻的中国历史，以及了解百年前的梅州风貌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窗口。这位诗人就是被梅州籍著名教育家廖道传称为“诗令尹”的黄荐鹗，民国时期的饶平县首任县长。

士子苦读求仕进，民国两次掌县篆

黄荐鹗，谱名黄遵荣，字继衡，广东嘉应东街堡（今梅州市梅江区攀桂坊）人，与著名诗人、外交家、思想家黄遵宪是同族远房兄弟，均为攀桂坊黄氏开基祖黄恬生的裔孙。



黄荐鹗生于晚清，早年师从邻近的宿儒杨穆吾，又曾在东山书院读书，于弱冠之年考中秀才入庠读书。1905年9月2日，清政府下诏宣布废止科举、兴办学堂，实行了1300年之久的科举制退出中国历史舞台，无数知识分子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从而改变自身命运的路径作古，黄荐鹗像其他知识分子一样必须寻找新的出路。

1906年，黄荐鹗以秀才身份考入广东法政学堂，成为广东法政学堂的第一届学员。清末民初广东风云人物陈炯明也同时入学，成为黄荐鹗同班同学。陈炯明后来加入同盟会，秘密从事反清活动，学业难免分心，时常在功课、听课笔记上求助于同窗黄荐鹗，两人友情甚笃。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不久，陈炯明被广东军政府推为代都督，黄荐鹗能出任民国时期饶平县的首任县长，除了自身的资历外，两人的私交也起到一定作用。在黄荐鹗的诗集里，可以看出他与陈炯明的交往，伴随着政局变化带来的宦海沉浮。

1913年“二次革命”后，陈炯明因反袁失败逃亡海外，黄荐鹗也失去饶平县长的职务，经汕头北上，先后游历上海、天津、北京。此后，他可能得到同乡好友杨少穆（其启蒙恩师杨穆吾之子）的引荐，沿长江入四川，任梁山县知事。黄荐鹗晚年游历福建漳州，去世前任广东海康分庭检察官。他一生走遍大江南北，耳闻目睹中日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晚清新政、辛亥革命、“二次革命”等历史事件，接触的历史人物众多，人生经历丰富，这些都在他的诗歌作品中有所反映。

诗歌创作重平实，记历史风云变迁

黄荐鹗喜爱写诗，养成走到哪里写到哪里的习惯，把所闻所见所思付诸笔端，其诗平易晓畅，客观记事，践行黄遵宪提倡的“我手写我口”，所到之处未有遗漏，作品编年成集，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

“同为爱国知名士，偏受龙逢惨酷刑。北阙呼冕天不雨，东园秘器夜沉星。岛夷未灭身先死，越寇飞来眼始醒。抄蔓传来瓜实尽，何人都下吊君灵。”1898年戊戌政变失败，谭嗣同等六人惨遭杀害，黄荐鹗写出《哭六君子》，表达对六君子悲惨命运的深切同情和沉痛哀悼。在他的《适可庐诗集》中，很多是写他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细腻描述了当时的社会现状，抒发自身情感。如《哭海军》《哭朝鲜》《哀党人》《外国联军人京》《羊城兵变》等，反映了一个知识分子在国家衰乱时期的真实心态。